

吉林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
延边大学“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朝鲜前期与明建州 女真关系研究

王 臻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朝鲜前期与明建州女真关系研究 /王臻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8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第8辑 陈星主编)
ISBN 7-5034-1679-3

I. 朝… II. 王… III. 建州女真—中朝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国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2005)第 076953号

朝鲜前期与明建州女真关系研究

责任编辑:杨玉文 封面设计:福瑞来书装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号 100811

印 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邮编:101109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9.25

字 数:257千字

印 数:1000册

版 次:2005年 8月北京第 1版

印 次:2005年 8月第 1次印刷

全套定价:260.00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总序

张立文

近代以来,西学潮水般地涌进,激烈冲击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适应于世界学术文化的发展,中国知识精英们纷纷吸纳西学。这种中西学术文化的交往和碰撞,是促使学术文化转型和发展的动力。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①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向现代转变。

中国学术文化在学习、接纳、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按西学的学科门类别类,以现在话语说便是与世界学术文化接轨。接轨意蕴着痛苦的冲突和融合:一是要转变传统学术文化的思维方式、立场观点、价值观念、评价标准,以适应西学的需要;二是要肢解传统学术文化的有机整体,选出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而叙述之,不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则抛弃之;三是变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主体的自我发展演化为被动的、受制于人的发展演化;四是要放弃一些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照着西方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讲。在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中,有得必有失,有收获也必有牺牲,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如何得多失少,收多损少,这便大有讲究。主张学术文化“全盘西化”者,“一边倒”学苏联者,则得少失多;学术文化保守主义者、国粹主义者,则失少得少,两者在得少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① 罗素:《中西文明比较》,胡品清译,《一个自由人的崇拜》,时代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 页。

在中西学术文化交流中,如何得多失少?应选择融突而和合转生的方式。印度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学术文化,在汉代传入中国后,便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生冲突,展开了“沙门敬不敬王”、“神灭不灭”、“因果有无报应”、以及“空有”、“夷夏”、“化胡”等辩论。到唐韩愈主张对佛教文化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①的简单拒斥方法,而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出入佛道。柳氏在回答韩愈指责他为什么不斥佛时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②柳宗元在当时对待儒、释、道三教的态度:一是以平等、同情的立场和视角看待三教,不扬此薄彼,或尊彼卑此;二是出入儒、释、道三教,才能深入各家学术思想的堂奥,既悉其本真,又知其长短;三是在出入儒、释、道之中,明三教冲突之所在,才能悉三教融合的关键。在这里冲突也是一种融合的方式,所以不能排斥冲突,而应融合冲突;四是吾所取于佛、道者,与《易》、《论语》合。换言之,柳宗元是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出发,以《易》、《论语》为“取”的标准,不是以佛、道为“取”的标准,即取佛、道以合于《易》、《论语》,而不是相反,从而在“统合儒释”中发展中国学术文化。

韩、柳两人对待外来学术文化与本土传统学术文化的立场、态度及其“取”法,对后世宋明学术文化影响巨大。宋初一派以“夷夏”、“费财”之辩拒斥佛教;另一派出入佛道,无论是张载、二程,还是朱熹、陆九渊、王守仁,都累年尽究佛、老之说,而后反求诸《六经》,终于在儒、释、道三教融突中和合转生为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学术发展的历史说明,粗暴的批判,取缔的暴力,激烈的拒斥,并不能消除一种思想、学说、理念对于人的思维、心灵的渗透和影响。韩愈主张对佛教采取强制僧侣还俗,焚毁经卷,没收庙产的做法,并没有阻止佛教的继续传播和发展。在唐代,绝大部分第一流知识精英与佛、道有很好的交往,以至相

① 韩愈:《原道》,《韩昌黎集》卷Ⅱ,《国学基本丛书》本。

② 柳宗元:《送僧浩初序》,《柳宗元集》卷25,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73—674页。

信佛、道,出现了一批伟大的宗教家,而没有造就伟大的儒学哲学家。伟大的儒学哲学家应该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统合儒、释、道三教之学者,宋明理学家沿着融合儒、释、道三教道路,出入佛老,反诸《四书》,和合转生,而开出理学的新学风、新思维、新理论。

在当今中、西、马学术文化交流互动的情境下,学术界在改革开放以后清算了极左思潮,开创了学术的春天,营造了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鼓励大胆探索,主张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既不要把学术探讨中出现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倾向性问题当作一般学术问题,明确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为学术研究和讨论松了绑。在这种学术的氛围中,中、西、马学术文化的冲突、融合,而喷发出智慧之光,中华学术文化在吸纳西、马学术文化中,和合转生为新的学术文化;西、马学术文化在中国化过程中,成为中国化的西、马学术文化。中、西、马学术文化融突和合,生生不息。

无论是中华学术文化的和合转生,还是西、马学术文化的中国化,都应从创新出发,立足于创新,落实于创新,创新是学术文化发展的硬道理。我们“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要“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我们要“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这里所说的“三个解放”,就为中华学术文化的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的“三个创新”,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和优越氛围。我们应该有下地狱的精神和盗天火的勇气来实现中华学术的这“三个创新”,建构中华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便是从这“三个创新”契入,回应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冲突和危机。他们各自从教育学、中西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心理学、逻辑学、新闻学、语言

学、科学等多视角、多层面探索问题。并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接触各种学术文化中的深层问题,提出种种化解之道。既有对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继承和新诠释,又有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吸收和新诠释。在融突“古今中西”学术文化中,尊重知识,尊重人品,尊重人才,尊重创新,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那末实现“三个创新”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是为序。

2004. 4. 6

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

序 言

延边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子敏

朝鲜是亚洲东方古老而文明的国家之一,由于同中国山水相连,关系密切,并深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影响,从而成为东亚汉字文化圈中的重要一员,故史称“小中华”。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到朝中古代关系史,中外学界多将朝鲜同中原皇朝之间的政治交往及文化交流作为热门话题,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相对来说,对我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政权同朝鲜半岛古族古国关系的研究则重视不够。王臻博士的学位论文《朝鲜前期与明建州女真关系研究》从朝鲜古代史的角度出发,对朝鲜王朝与明朝边疆民族建州女真的关系进行了专门探讨,并将其视为古代朝鲜与中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写作方式实在是难能可贵。显然,这种研究视角自有其独到之处,至少是填补了中国学界在此方面之空白。

女真族乃是我国古代东北的一个古老而著名的民族,正是其中的建州女真人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王朝。女真人的最早先族肃慎远在中国的传说时代就已同中原王朝发生了朝贡关系,到了周武王灭商之后,被宣布为西周政权的“北土”之一部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肃慎的南部包括了我国今延边地区、朝鲜半岛之东北部。及铁器时代,东北亚地区的古族古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彼时作为战国七雄的燕国向东北拓疆,在今医巫闾山以东直到清川江北岸设置了辽东郡,及秦汉之时,继战国之后中原向东北地区的移民后浪推前浪,接连不断。中原地区政治势力的东渐以及移民浪潮的形成,是

推动东北亚民族变迁的重要原因,彼时的辽东之貊大多为燕汉之族同化,而分布于今吉林省中部的秽人地区(“西团山文化”分布区)建立了夫余国,其中有一部分秽人向东越过哈尔巴岭迁往古肃慎之南部,即今我国的延边地区、牡丹江地区东部以及俄国的滨海地区、朝鲜半岛东北部,与土著的肃慎族相融合而形成了沃沮这一新的民族共同体,沃沮之北的古肃慎族改名为挹娄。迁入今朝鲜江原道的秽人与本地土著民族融合而为东秽族。自箕子东来降至卫满建国、汉武帝建郡、高句丽东拓建都于平壤,渤海继高句丽之后而兴起,在几千年时间里中国的少数民族及汉族在开发朝鲜半岛北部的过程中都有过重要贡献,并对朝鲜半岛的历史和文化产生过强烈影响。及辽代之初,恰是女真形成之际,南下的黑水靺鞨进入朝鲜半岛北部之后,同该地留居的渤海人相融合,形成了高丽人所称的“东女真”和“西女真”,继其先人之后,女真人同朝鲜半岛的新罗(末期)、王氏高丽乃至李氏朝鲜比邻而处,关系颇为密切。但王氏高丽建立之后,长期以高句丽继承者自居,一贯奉行“北进”政策,不断地侵蚀女真人的家园。历史发展到明代,亦即建州女真形成之时,李朝基本上占有并控制了鸭绿江、图们江南岸地区,因而朝鲜同建州女真的种种关系,成为彼时朝、中关系的重要交往内容。如何理顺朝鲜与女真、朝鲜与明朝以及女真与明朝的关系问题,正是王臻博士这本专著的重点阐述所在。

王臻博士的这本专著尽管是以朝鲜史为主线,从“换位思考”的角度分析朝鲜的外交政策,探讨其与中国明皇朝及边疆民族的关系,但在问题的具体论述上,同国外尤其是同朝鲜和韩国学界的相关看法有不同的观点。朝鲜半岛学界在研究或叙述朝中关系史时,无疑都是站在本国的立场上看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民族主义史学观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秉持之方法论,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存在较大的片面性。例如,许多学者将女真族看成是朝鲜半岛的“外来户”、“入侵者”,将高丽、李朝“北进”扩张政策的实施看成是“恢复”高句丽时期的固有领土,用民族歧视的眼光评论女真族的是是非非,夸大“女真”外交的消极因素甚至将“事大”史观同殖民史观相提并论,等等。王臻博士站在

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的高度,实事求是地叙述了相关的历史真实,对某些历史现象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概括,有理有据地得出了符合历史实际符合逻辑的正确结论。仅就“朝中传统政治秩序的演进”来看,作者在叙述了朝、中传统宗藩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事大”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地、辩证地揭示了它的精神实质,指出在古代历史条件下,朝鲜半岛古国所采取的“事大”外交是彼时唯一的正确选择。“事大”是小国对大国、弱国对强国、穷国对富国的外交政策,而“字小”则是大国对小国、强国对弱国、富国对穷国的外交政策,“事大”和“字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君臣如父子,虽说这里有严格的规定,但毕竟“父子”是一家人。专著中引用了朝鲜古代著名史学家在《三国史记》中的一段话:“(新罗)以至诚事中国,梯航朝聘之使,相续不绝。常遣子弟造朝而宿卫,入学而讲习,于以袭圣贤之风化,革鸿荒之俗,为礼仪之邦。又凭王师之威灵,平百济、高句丽,取其地郡县之,可谓盛矣。”接着作者指出:“短短的几句话,颇为明确地说出了新罗实行事大外交政策的目的与结果,……在这里,事大的目的和结果是一致的,即是通过事大外交,而吸取中国的文明,用以改变新罗落后的面貌,以便使新罗亦成为礼仪之邦,跻身于世界文明之林。”同时又指出后来的王氏高丽“吸取了高句丽、百济国灭亡的教训以及新罗昌盛的经验,坚定不移地实行事大外交政策,全面而广泛地吸收唐、宋的先进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自身社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当然作者又指出:“及至历史发展到了近代,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封建的事大政策也由兴盛而走向衰亡”,至于“有些外国学者在叙述历史时,用近现代的国际关系准则去硬套古代的朝中关系,甚至将古代的中朝关系同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关系相提并论,这在历史研究方法论上是欠妥的”。我国朝鲜族学者姜龙范教授在其《近代中朝日三国对间岛朝鲜人的政策研究》一书中曾说:“中朝两国的政治关系,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而建立的封建宗法关系。因此给两国关系添上身份、礼仪和亲情的成分”。其中“亲情”的说法,得其中朝古代友好关系的“要旨”矣。帝国主义同殖民地的关系有“亲情”可言吗?将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相提并论,同日而语,无

论从史学观还是方法论上来看,都是不妥当的。

王臻博士在专著中大量地使用了朝鲜古文献《李朝实录》中的资料,并借鉴、吸取了朝鲜、韩国学界近人的研究成果,对比论证,这亦是一大特色。但是,所不能尽如人意者,在于对朝鲜其它古文献的利用尚嫌不足,例如《备边司誊录》、《同文汇考》、《承政院日记》等。由于我国史书存在着详中原而略边疆的弱点,而在对东北地区某些古族(如高句丽、女真)的记载方面,朝鲜有些史书更有特色也更为详细,这些宝贵的史料在细化相关问题研究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因而希望王臻同志能在今后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多运用一些朝鲜文献资料,相互比较,以深化对问题的研究。

谨为之序。

2005年5月18日于延边大学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朝鲜王朝与明代建州女真关系的历史渊源 ...	(13)
一、高丽与辽宋金时期女真的交往	(13)
(一)高丽与辽朝女真的贸易往来和武装冲突	(14)
(二)“曷懒甸之战”与高丽对金朝称臣	(20)
二、元朝末期高丽对朝鲜半岛北部女真的招抚	(29)
三、明朝初期高丽对女真人的争取行动	(33)
(一)围绕铁岭立卫高丽与明朝之边界纷争	(33)
(二)高丽末期对女真人的招抚举措	(38)
第二章 十五世纪朝鲜王朝与明皇朝对建州女真部的争夺	(41)
一、朝鲜太宗与明朝争夺建州女真隶属权的斗争	(43)
(一)太宗与明朝对图们江流域女真统辖权的争夺 ...	(43)
(二)太宗设法阻挠猛哥帖木儿部归附明廷	(52)
(三)太宗对毛怜卫把儿逊部的怀柔与征讨	(64)
二、朝鲜世宗对建州女真的安抚与征伐策略	(69)
(一)世宗对猛哥帖木儿回迁之安抚政策	(70)
(二)世宗时期朝鲜对李满住建州卫的两次兴兵	(76)
(三)世宗怀柔建州女真凡察、董山部	(86)
三、朝鲜世祖对建州女真的优抚与打击政策	(100)
(一)世祖王对毛怜部郎卜尔罕女真的政策	(100)

(二) 世祖王对建州部董山的招诱	(110)
(三) 朝鲜与明联合讨伐李满住建州卫	(117)
四、太宗至世祖时期朝鲜王朝与建州女真的关系	(127)
第三章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前半期朝鲜王朝与建州女真、 明朝的三角关系	(132)
一、宣祖时期朝鲜与努尔哈赤建州女真的交往	(132)
(一) 朝鲜对努尔哈赤“出兵援朝御倭”提议的抵制	(132)
(二) 围绕越境采参问题朝鲜与努尔哈赤的交涉	(142)
(三) 朝鲜对努尔哈赤“请京受职”的态度及防范措施	(152)
二、光海君时期朝鲜的中立外交活动	(156)
(一) 后金犯明与朝鲜对明请求助兵的反应	(157)
(二) 朝鲜出兵助明抗金(“萨尔浒之战”)	(163)
(三) 针对朝鲜将领降金问题朝鲜、后金、明朝的态度	(175)
(四) 围绕毛文龙问题朝鲜与后金的交涉	(184)
三、仁祖时期朝鲜与后金、明朝的三角政治态势	(188)
(一) “丁卯之役”与朝鲜、后金间的“兄弟之盟”	(188)
(二) “丁卯之役”后朝鲜与后金及明朝的三角关系	(200)
四、宣祖至仁祖时期朝鲜王朝与建州女真的关系	(218)
五、朝中传统政治秩序的思考	(221)
第四章 朝鲜王朝前期与建州女真的经济贸易交流	(231)
一、朝鲜王朝与建州女真贡赐贸易的发展	(231)
(一) 朝鲜王朝与建州女真初期的平等性贡赐贸易	(232)
(二) 后金政权对朝鲜王朝的强制性贡赐贸易	(240)
二、朝鲜王朝与建州女真的边境互市贸易	(244)
(一) 朝鲜王朝与建州女真初期的互补性边疆贸易	(244)
(二) 朝鲜王朝应后金要求而开设互市	(248)
三、贡赐贸易和边境互市对朝鲜王朝及建州女真的影响	(253)

(一)经济贸易交流给朝鲜王朝带来的影响	(253)
---------------------------	-------

(二)经济贸易交流对建州女真发展所起的显著作用 ...	(254)
-----------------------------	-------

结 论	(257)
-----------	-------

附录一 大事年表	(260)
----------------	-------

附录二 主要引用史料及参考书目	(265)
-----------------------	-------

后 记	(277)
-----------	-------

前言

朝鲜与中国接壤相接,两国关系源远流长。从遥远的古代开始,朝中两国就结成了相当密切的联系,友好往来不断,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数千年来,朝鲜半岛上的古代国家与中国大陆同时代的封建政权之间,不管两国的历代王朝如何更迭,都不曾改变彼此间的联系,两国政府及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十分频繁,从而使两国间的各种关系得到不断加强。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于 1392 年建立后,积极推行同中国明皇朝(1368 年建立)的睦邻交往政策,与明朝保持了长达二百余年的传统友好关系。特别是在万历二十一年(1592 年)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的抗倭战争中,朝鲜军队与明军联合作战,制止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李氏朝鲜成为明皇朝关系最密切的藩属国。而正是以朝鲜王朝对明皇朝朝贡关系为基础,构成了当时朝中传统政治秩序的基本格局。

在中国明皇朝进行交往的同时,朝鲜王朝还注意与其地理位置接壤的中国东北边疆民族的交往。这其中,朝鲜王朝与中国满族之前身——女真族的关系,成为彼时期朝中两国政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朝中关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女真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很早以前就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自辽朝时期女真族正式形成之后,朝鲜的高丽政权便与辽、金、宋、元王朝内部的女真部落之间,有了诸多友好交往和矛盾冲突。到了李朝前期,为了顺利推行北拓政策,当时的朝鲜统治者更注重发展与明朝北方边疆民族女真族的关系,尤其是对建州部女真,不断实施驱逐、镇压以及同化措施,恩威兼施,打拉并举。

明代的女真,分布范围很广,据《大明一统志·女真传》记载:“女

真,东濒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北海”。明朝时期,按照生活方式和经济状况以及地区分布,女真族分为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部,其下各有若干大小不等的部落。居住在黑龙江两岸和乌苏里江流域的为“野人女真”(或称东海女真);居住在开元(今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古城)以东和松花江中游一带的称“海西女真”;而遍居于长白山北部图们江、牡丹江和绥芬河流域的则为“建州女真”。建州女真是中国女真族中最有影响的一个群体,同时它也代表了女真族发展的大方向,正是它后来取代了腐朽的明王朝,建立起了统治时间达二百七十余年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清朝。

当时朝鲜当局对待明朝北方边疆民族建州女真采取的是怀柔与打击的两手政策,而这一点与明朝统治者对待建州女真的态度有同有异,因而在如何对待建州女真问题上,朝中两国的关系出现了颇为复杂的局面。由此看来,着重探讨一下朝鲜王朝同建州女真关系的来龙去脉及其本质内容和历史规律,对深入了解明朝时期的朝中关系很有必要。

因朝鲜与建州女真人地壤毗邻,在建州女真发展初期,朝鲜王朝一度曾利用此特殊的地理条件,同明皇朝争夺对女真的统治权。而正是由于疆土相连,朝鲜与建州女真之间发生了一些边界冲突,即朝鲜曾兴师侵入建州,建州女真也曾派兵寇犯朝鲜。及至建州女真建立起后金割据政权与明皇朝公开决裂,传统的朝中政治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本以汉族政权为主流同朝鲜的关系,进而演变成以女真族政权为主流同朝鲜王朝的关系。从朝鲜外交政策而言,其与建州女真民族政权、明皇朝构成了三角外交关系。这其中,朝鲜王朝扮演了重要的中间角色,在东北亚局势动荡的情况下,它灵活地处理与上国明皇朝及新兴势力后金之间的政治关系,达到了在夹缝中生存的目的。朝鲜政府的政治外交策略颇引人注目。

从建州女真方面而言,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当初期羽翼未丰时,是顺事朝鲜王朝,向朝鲜纳贡,请求授职,积极发展同朝鲜的友好关系,以图建州女真有一个生存的空间。而当建州女真建立后金政权同明朝公开决裂之后,先是极力拉拢朝鲜,以消除女真人在与明朝分庭抗礼之

斗争中的后顾之忧,继之发动对作为明朝附属国朝鲜的战争,对朝鲜采取强硬政策,先结为“兄弟关系”,继之使朝鲜臣服,成为自己的藩属国。建州女真在弱小与强盛时期,对朝鲜所采取不同政策的做法,也值得认真加以分析和研究,进而可以揭示出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朝鲜王朝与明朝时期建州女真的关系,是朝中关系史上的重要篇章,因而历来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以下分为国内和国外两部分,加以述评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于朝鲜王朝与建州女真之间的关系,国内史学界的诸多著作曾经作了或多或少、或简或繁的论述。孙进己、张璇如等的《女真史》是一部较全面地介绍女真民族起源、发展过程历史的著作,其中对我国辽、元代的女真与朝鲜半岛上同时代的高丽之间的关系,概括地予以说明;但对于明代女真与李朝的关系,却未涉及到。在董万仑的《东北史纲要》、佟冬等的《中国东北通史》这些东北地方史著作中,女真族作为中国东北边疆的重要民族之一,自然被列入东北历史的阐述内容;并且,书中提到了朝鲜历史上的各个王权与其邻境的女真(包括明代建州女真),开展经济贸易以及边界冲突的一些史实。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撰写的《中朝关系通史》、蒋非非、王小甫的《中韩关系史》(古代卷)、姜龙范、刘子敏的《明代中朝关系史》等,属于中朝(韩)关系史著作,主要探讨的是各时期中朝双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女真地理位置正处于中朝边境,女真与朝鲜关系的发展是彼时中朝两国关系的重要内容,在两国的对外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这些关系史著作都设有专节,来介绍高丽与女真、李朝同女真(包括明代建州女真)的各种友好关系和矛盾冲突。这其中,由于姜龙范、刘子敏的《明代中朝关系史》属断代史著作,故对朝鲜与女真关系内容的阐述更为详细些。

但这些著作的特点是,或者只限于叙述女真的发展史,或者泛泛地介绍女真与朝鲜的一些交往史实,停留于史实的平铺直叙;而对朝鲜与后来建立满清王朝的建州女真之间一些深层次问题的研究,探讨力度尚嫌不足,未能达到就相关内容展开具体论述,且少有从理论的高度进

行某些专题研究。

论文方面,国内亦有一些相关成果出现。代表性的论文有李善洪的《猛哥帖木儿与朝鲜的关系》,论述了满族肇祖猛哥帖木儿从顺事朝鲜到游离于明廷与朝鲜之间的问题。王兆兰的《十五世纪三十年代朝鲜两次入侵建州》,介绍的是1433年和1437年朝鲜前后两次征伐李满住建州卫之事;刁书仁的《成化年间明与朝鲜两次征讨建州女真》叙述的则是1467(明成化三年)及1479年(明成化十五年)明朝与朝鲜联军合击李满住、董山建州女真的事情。台湾陈捷先的《清太祖时期满洲与朝鲜关系考》,运用大量史料,考证了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之后与朝鲜的种种交往。陈捷先的《略论天聪年间后金与朝鲜关系》和李治亭的《后金与李氏朝鲜战争述略》,则阐述的是后金汗皇太极在位时期对朝鲜发动战争的情况。

尽管上述论文所研究的角度和领域各有侧重,并谈出了在明朝的不同时期建州女真与朝鲜王朝的各种复杂关系问题;但笔者认为,相对于建州女真的整体发展过程而言,这些论文只局限于建州女真与朝鲜的个案研究,宏观研究不足,未能系统完整地体现出整个明代建州女真与朝鲜的关系史,因而不利于对建州女真与朝鲜关系的整体认识。例如,对一些重要阶段、重要事件的研究尚存薄弱环节,或者说有空白之处:凡察及董山时期的建州女真,与朝鲜交涉颇多,可是鲜见于相关论文;作为建州卫子卫的毛怜卫首领郎卜尔罕,最终是被朝鲜杀死,此应是建州女真与朝鲜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然少有专题探讨。另外,这些论文的共同特点是,在研究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包括高丽、李朝与女真的关系)时,是以中国史为主线,从中国对朝鲜关系的角度来探讨问题。对女真同朝鲜关系的研究亦是如此,即总是站在把女真作为中国境内一个边疆民族跟随明政权开展与朝鲜关系的角度,来探讨其与邻国朝鲜的交往。吉林省社科院孙与常的论文《李朝与建州女真的关系》,尽管把李朝放在前面,但还是从中国史的角度来探讨中朝关系,并没有着重强调明皇朝在其中的作用问题。实际上,朝鲜如何对待明天朝境内接壤朝鲜国土的一些边疆民族,这是朝鲜对外政策的一个内